

# 从早期蜻蜓眼式玻璃珠的传入 看汉以前的中外交通

李 会 (华中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郑建国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摘要：**中国早期的蜻蜓眼式玻璃珠的传入与欧亚大草原和伊朗高原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蜻蜓眼式玻璃珠的传入路线反映了汉以前，中国不仅通过欧亚大草原与地中海一带发生联系，而且与伊朗高原一带亦有紧密的关系。同时，一些学者所认为的蜻蜓眼式玻璃珠从印度首先到达中国南部的云南和经海路商道引进的观点，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考古资料都无法证实西汉前这两条蜻蜓眼式玻璃珠路线的存在。

**关键词：**蜻蜓眼式玻璃珠；地中海；伊朗

**中图分类号：**K87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962(2010)02-0071-07

蜻蜓眼式玻璃珠无论是其质地还是其图饰对战国以前的中国来说都是新奇的。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随着洛阳金村一批蜻蜓眼式玻璃珠的发现与流失到国外，引起国外一批学者极大的兴趣，遂开始了中国古玻璃的研究<sup>[1]</sup>。中国境内，蜻蜓眼式玻璃珠首先在新疆出现，如新疆轮台轮台群巴克 IM27 出土的一颗蜻蜓眼式玻璃珠可以追溯至西周中期至春秋中期<sup>[2]</sup>。且末扎滚鲁克 M14 所公布的 3 颗蜻蜓眼式玻璃珠的时代为春秋早期<sup>[3]</sup>。随后于春秋末战国早期在山西，河南，山东，湖北，湖南出现了一批。从战国中期开始，随着楚人对玻璃制造技术的掌握，蜻蜓眼式玻璃珠与一批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玻璃产品以楚地为中心广泛分布于中国南北 14 个省。秦以后，蜻蜓眼式玻璃珠在中国逐渐销声匿迹，只是在云南，新疆，广东等地发现少量的汉代蜻蜓眼式玻璃珠。无论是从玻璃珠的化学成份还是出土的样式与数量来说，战国中期前的蜻蜓眼式玻璃珠应当和域外有着密切的联系。学界对其起源基本形成共识，即这类珠饰最初起源于国外，中国早期

的此类玻璃珠应是从国外引进。

然而对其传入路线，还存在诸多的争论。关于这个问题，目前存在三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观点认为蜻蜓眼珠经中亚而来，如安家瑶认为在公元前二千纪和一千纪的铜器时代，东西两大文明之间活跃着许多游牧民族，他们依靠牲畜的力量，往来于漫漫的中亚沙漠地带，游牧民族将这种珠饰从西亚带到中国是完全可能的<sup>[4]</sup>。第二种观点为经印度首先到中国的南方——云南省。如张正明先生指出蜻蜓眼式玻璃珠从印度传入的可能性最大<sup>[5]</sup>。第三种观点为蜻蜓眼式玻璃珠经海路首先到吴广之地，再经此传入内地。如后德俊在《楚国的矿冶、髹漆与玻璃制造》中提出这一可能<sup>[6]</sup>。

本文作者将结合中外玻璃珠的分布情况和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之上一探中国蜻蜓眼式玻璃珠的来源与传入路线问题以及所反映的中外交通。

学者所提出的经印度传入云南和海路而来，涉及到南方丝绸之路和海路的开通问题。首先让我们看看由印度传入的观点。

印度最早的蜻蜓眼式玻璃珠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1400~1000 年之间。然而公元前 2 世纪之前的蜻蜓眼式玻璃珠在印度并不丰富,数量极其有限。虽然印度的玻璃珠起源存在着从地中海还是从伊朗直接引进的争论。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印度早期的玻璃亦是从外引进,而且蜻蜓眼式玻璃珠无论是从地中海而来还是直接从伊朗引进都必需通过跟伊朗的接触而传入印度。因此,至少在公元前 2 世纪之前,印度还是作为一个消费国引进蜻蜓眼式玻璃珠,而且数量也是极其有限。

从蜻蜓眼式玻璃珠在中国的分布来看,南方蜻蜓眼式玻璃珠数量极少。仅在晋宁石寨山发现几枚蜻蜓眼式玻璃珠及一枚素面玻璃珠<sup>[7]</sup>。但是这些玻璃珠饰的年代为汉代。因此,这就存在一种可能,即从时代上看,它们完全可能为中国自产的玻璃制品。随着中国特有的蜻蜓眼式玻璃珠和中国特色的玻璃制品,如玻璃璧,环和玻璃剑饰的出现,足以证明中国至少从战国中期开始就可以独立制造玻璃,这一点应是确定无疑的。因此,石寨山所出土的玻璃制品极有可能是中国自产的产品而并非从印度而来。

除却玻璃珠,江川李家山春秋晚期的 24 号墓葬中,出土了一颗蚀花石珠<sup>[8]</sup>。有些研究者以此为证据说明云南经缅甸与印度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云南的蜻蜓眼式玻璃珠即是这种联系的产物。蚀花石珠源于印度,在中亚,天山,帕米尔一带分布着大量的蚀花石珠。传入中国的蚀花石珠主要分布在云南以北的地区。这一分布情况似

乎和经缅甸首先传入云南的情况相悖。同时,中国西边的兴都库什(Hindu Kush)在连接印度和中亚一带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Codrington 指出高纬度的兴都库什一路延伸穿过 Kunduz 和 Ghorband 峡谷,是通向印度的道路之一<sup>[9]</sup>。Evert 亦指出阿姆河上游山谷穿过兴都库什直到印度是北部草原之地至农业定居地区的通道之一<sup>[10]</sup>。而亚历山大正是经巴克特里亚穿过兴都库什率军南下侵入印度。以此看来,蚀花石珠完全有可能由印度穿越兴都库什进入帕米尔再传入中国新疆,进而传入中国其他地区。中国西南的民族走廊是联系中国北部与南部的通道,借助这一通道一些北方文化因素南下进入云南,如云南青铜文化中大量的斯基泰因素。因此,蚀花石珠传入中国北方后亦可由此道南下到云南。同样,如果云南的蜻蜓眼式玻璃珠为外来物的话,国外玻璃珠的分布情况与连接南北的民族通道使这些玻璃珠首先到达中国北部再进一步引入云南亦成为可能。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学者纷纷把眼光投向西南,积极展开有关西南与南亚交通的研究,尤其是与印度联系的研究,并提出西南丝绸之路即川滇缅印道。这条道路由云南大理,沿永昌道出境。因此,一些研究者指出云南出土的玻璃珠和蚀花石珠正是通过这条道路来到云南,并且,这些出土物是这条道路存在的最好证明。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不少学者也对这条路线提出质疑。如吴焯在分析大量史料的基础上,提出西南丝绸之路的研究存在着诸多认识误区并指出大西南古代早期的中西交通,以今日论之,将其比之羊柯道和蜀交趾道或较川滇缅印道更为切合历史实际,也更为科学。而且这两条道路在汉代才起到沟通中外的作用<sup>[11]</sup>。因此,这两条道路和汉以前的蜻蜓眼式玻璃珠的传入应无多大关系。

总之,中国南方所出土的蜻蜓眼式玻璃珠不仅在时代上已经晚至汉,而且数量极其有限,仅晋宁石寨山一处出土。云南所出土其他域外物亦尚不能证明这些器物都是经西南丝绸之路而来以及云南和印度有着紧密的联系。反而是它们从北方南下更为合理。因此,蜻蜓眼式玻璃珠从印度经云南引进这一说法实难成立。

如果蜻蜓眼式玻璃珠经海路而来,则第一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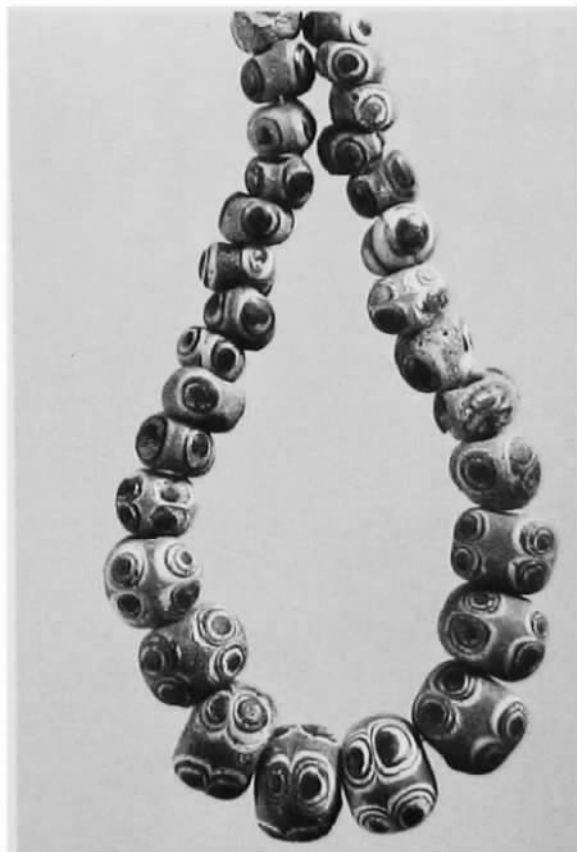


1.蜻蜓眼式玻璃珠项饰,来自地中海地区,公元前 6-1 世纪, E. Marianne Stern/Birgit Schlick-Nolte, Fruehes Glas der alten Welt 1600 v. Chr. - 50n. Chr. Sammlung Ernesto Wolf Verlag Gerd Hatji 1994, P199.

应当是东南沿海地区。出土有蜻蜓眼式玻璃珠较早的吴墓就是河南固始侯古堆发掘的勾吴夫人墓,时代为春秋晚期。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吴国阖闾“十一年(公元前504年),吴王使太子夫差伐楚。楚恐而去郢”<sup>[12]</sup>。这说明春秋末年吴国太子曾统兵攻打楚国,并攻占了楚国的番地。今天的河南省固始县正是番国的所在地,番是楚国的重镇之一。夫差的妻子随夫出征,在吴兵占领番之后暴亡,因正处战争时期,吴人就将她就地厚葬。该墓内棺出土几颗蜻蜓眼式玻璃珠,其化学成份为钠钙玻璃,较之中国后来自产的铅钡玻璃,这些无疑是从国外引进之物。后德俊在《楚国科学技术史稿》一书中推测“侯孤堆1号墓中所出土的蜻蜓眼式玻璃珠,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吴人攻占楚国番地时夺取它们,因为当时比较稀少和珍贵,因此用来给统帅的夫人配置”<sup>[13]</sup>。

广州黄花冈3号墓和南越王墓也都出土了少量镶嵌玻璃珠,两墓时代均已经到了西汉,与早期玻璃的传入路线应没有多大关系,而且也存在是中国自产的可能。假如走海路经吴越之地而来,那么,中国的东南沿海一定能发现很多先秦进口的玻璃。可是这样的实证不仅数量少,而且根本不能证明此路线的存在。装饰有玻璃的吴越铜剑,除越王剑一把外,还有吴王剑一把,它们分别在湖北和河南出土。学者指出,原本没有玻璃装饰,剑柄上玻璃为楚人后来安装上去。因此此证无法证明当时在越国和吴国就已经存在玻璃。况且,在东南一带其余诸多文化遗址中,难见玻璃的踪影。从广东肇庆市北岭松山的战国墓葬中,出土了几把楚式剑和一颗蜻蜓眼式玻璃珠<sup>[14]</sup>,它们只能证明五岭以南的越人与五岭以北的楚人有联系,还不能证明这颗蜻蜓眼式玻璃珠来自海上。

如果有蜻蜓眼式玻璃珠从海路而来,必定要经过东南亚一带。以此相应,应有不少这一期间的玻璃制品在东南亚发现。然而,根据考古发掘资料,事实并非如此。Lois指出东南亚一带的玻璃制品应当和伊斯兰的扩张有关,即使是有的东南亚所出土玻璃品可以追溯到罗马商人携带至此。如Bornea岛的Dayak人所珍视的蜻蜓眼式玻璃眼珠应是从地中海的罗马而来<sup>[15]</sup>。Alastair



2. 蜻蜓眼式玻璃珠项链, 伊朗吉兰省(Gilan), 公元前4-2世纪, Shinji Fukai, Persian Glass, John Weatherhill, Inc., of New York and Tokyo 1977, 彩图40。

指出马来半岛的玻璃珠出现的非常晚<sup>[16]</sup>。Kishor进一步指出,蜻蜓眼式玻璃珠以公元一千纪的中叶至公元1100/1200才出现<sup>[17]</sup>。因此,所有这些只能说明一个事实,东南亚的蜻蜓眼式玻璃珠要比中国所出土的在时代上要晚很多。蜻蜓眼式玻璃珠经海域商道传入中国的说法在考古发现的事实面前显然无法成立,所以,走海路可以说是查无实据。

通过以上论证,蜻蜓眼式玻璃珠从印度传入云南和经海路而来的观点在考古材料面前都实难成立。与此同时中亚一带在蜻蜓眼式玻璃珠的传入中所起的作用不得不让人注意。

根据考古发现,学者基本认同这种独特的珠饰起源以埃及的十七王朝与二十王朝之间。如在Eisen的文章里,一些蜻蜓眼珠追溯到十八朝<sup>[18]</sup>。在Tell el Yehudiyeh一些蜻蜓眼式玻璃珠被定为二十王朝<sup>[19]</sup>。

作为地中海地区的一部分,埃及和地中海沿



岸国家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蜻蜓眼珠式玻璃珠在埃及出现后迅速传遍整个地中海地区。不久,位于欧亚大草原西部的黑海北岸也成为蜻蜓眼式玻璃珠分布密集的地方,而且出现东传的趋势。

通过对中国出土的蜻蜓眼式玻璃珠与地中海一带玻璃珠的对比研究,George把洛阳金村的蜻蜓眼式玻璃珠的来源指向地中海<sup>[20]</sup>。而蜻蜓眼式玻璃珠的化学成分也意味着中国所出土的蜻蜓眼式玻璃珠与地中海一带的渊源关系。Earle结合金村出土玻璃珠的化学成份与式样,指出无论是花纹还是化学成份,一部分玻璃珠都和埃及出土的蜻蜓眼式玻璃珠具有完全一致性<sup>[21]</sup>。

从考古出土物来看,根据Kari的记载,仅多层眼珠蜻蜓眼式玻璃珠这一式玻璃珠在黑海北岸就达到900多颗,另有400多颗发现于库班(Kuban)地区<sup>[22]</sup>。

Hall和Yablonsky经过研究论证指出,居住在伏尔加河地区,南部乌拉尔,第聂伯河(Dnieper)和乌拉尔山(Ural)之间的萨尔马提亚人(Sarmatian)的玻璃珠是从黑海或者是东地中海地区引进<sup>[23]</sup>。

在Saka时期,位于费尔干纳,天山,帕米尔地区的Saka妇女墓葬发现大量的各式珠饰,其中就包括蜻蜓眼式玻璃珠。

因此,考古发掘资料证明,从欧亚草原的西

部到新疆的西部——费尔干纳,天山,帕米尔之间分布着大量的蜻蜓眼玻璃珠。这一分布特色展示出欧亚大草原在蜻蜓眼珠传入中国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新疆紧邻欧亚大草原,可以说是中国对外联系的第一站。因此,在欧亚大草原大量分布的蜻蜓眼式玻璃珠进一步向东传入新疆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同时,其他的考古证据也显示出位于中国西部的新疆在丝绸之路凿空之前就与紧邻的欧亚草原一带存在着紧密的接触。就像Seligman和Beck指出的那样,虽然横贯整个亚洲联系欧洲和中国的商贸大路直到公元前2世纪才组织化,但是远在这之前远东和欧洲早就通过横贯欧亚草原辗转相传的贸易间接联系起来了<sup>[24]</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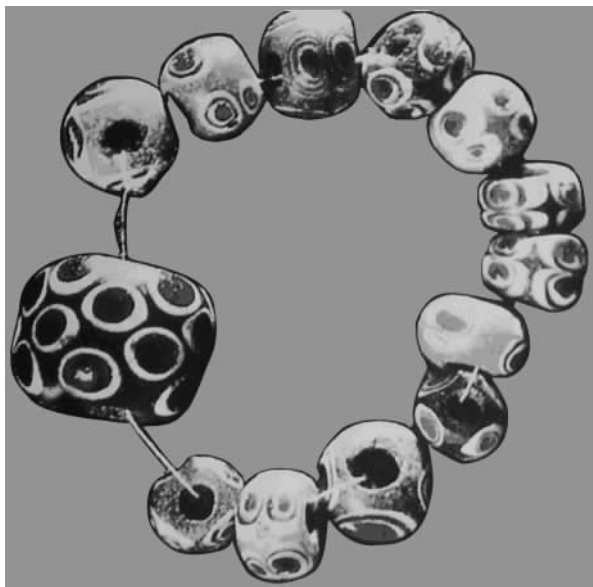
在阿尔泰地区的Pazyryk,公元前6世纪到4世纪的斯基泰墓葬发现了丝绸,报告明确指出是中国丝绸。同时,除了丝绸之外,中国山字纹镜的发现更是引人瞩目<sup>[25]</sup>。

Oppenheim通过对中亚,西亚的贸易研究,指出从公元前2千纪中叶开始,中国就开始用一卷卷丝绸换取马匹。经此,这些中国丝绸就辗转流传到了近东<sup>[26]</sup>。

因此,无论是欧亚草原上的蜻蜓眼式玻璃珠的分布还是其他考古资料的证明都显示出中国早期的蜻蜓眼式玻璃珠从地中海地区经欧亚草原到达中亚再传入中国的极大可能性。这条传入路线也意味着早在西汉前,中国与地中海一带通过欧亚大草原发生着积极的联系。

对于欧亚大草原在早期的中外交通中的作用,学者已经多有论述,而对南方伊朗的作用鲜有提及。通过对蜻蜓眼式玻璃珠的研究,笔者还想提出另外一种可能性,伊朗在西汉以前的中外交通中亦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部分蜻蜓眼式玻璃珠亦是经伊朗高原而来。笔者在此提出以供大家商榷。

随着蜻蜓眼式玻璃珠的广泛传播,西亚随之也发现大量的蜻蜓眼式玻璃珠。在伊朗吉兰省(Gilan)最早的蜻蜓眼式玻璃珠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千纪的早期。Spaer通过对玻璃珠尤其是蜻蜓眼式玻璃珠的研究指出,从公元前十六世纪末至公元前十二世纪,玻璃的生产不在局限以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埃及(Egypt)和迈锡



3.蜻蜓眼式玻璃珠,山西太原,公元前475-450,干福熹:《中国古代玻璃技术的发展》,上海科技出版社2005,7:12。

尼时期的希腊 (Mycenaean Greece), 在累范特 (Levant), 塞浦路斯 (Cyprus), 小亚细亚 (Asia Minor), 波斯 (Persia) 已经都有生产<sup>[27]</sup>。这也就是说, 蜻蜓眼式玻璃珠的生产不再局限在地中海地区, 波斯已经有自己的能力独自生产。

伊朗历来是联系中亚, 印度与美索不达米亚以及地中海地区的中间枢纽, 在这些地区的文化交往中的作用可以说是至关重要, 不可或缺。公元前4千纪之公元前2千纪期间, 雪花石, 大理石, 黑曜石, 绿泥石, 青金石, 绿松石等都经由伊朗运往资源相对短缺的美索不达米亚<sup>[28]</sup>, 甚至有的进一步西传之地中海地区。例如, 从新石器时代开始, 阿富汗北部的青金石就源源不断地通过伊朗输入美索不达米亚与地中海, 形成了著名的青金石之路<sup>[29]</sup>。来源于印度的蚀花石珠不仅北上传入中亚一带, 而且大量地传入伊朗, 然后再继续西传达到美索不达米亚与地中海地区。这一切显示出伊朗在地中海与中亚, 印度的交流联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作为连接东西的桥梁, 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相应, 波斯与相邻国家存在着发达的交通。根据记载, 从非常早的时间开始伊朗已经存在三条对外路线, 即 (1) 波斯御道 (the Persian Royal Road) (2) 北部伊朗路线 (3) 南部路线从德黑兰 (Tehran) 到麦什德 (Meshed), 并凭借其天然地理上的延续一直到达印度<sup>[30]</sup>。借助这三条路线, 古伊朗与地中海, 美索不达米亚与中亚, 印度紧密联系起来。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波斯御道。有学者指出, 这条道路开始以公元前7世纪。其后, 大流士在位期间, 为不断崛起的波斯帝国建造了一个庞大的交通网络来连接波斯的边缘前哨和位于苏萨 (Susa) 的首都。在这个庞大的交通网络中就包括波斯御道。波斯御道从地中海东部地区的萨迪斯 (Sardes) 经苏萨 (Susa) 过波斯之门 (Persian Gates) 一直到木尔加布平原 (Murghab) 的波斯波利斯 (Persepolis)。显然, 这条道路经美索不达米亚把地中海和波斯连接起来<sup>[31]</sup>。正是这条道路继续向东延伸, 成为后来著名的丝绸之路。由此可见, 波斯御道成为连接波斯与位于西部的地中海地区的一条交通要道。

北部伊朗路线。伊朗北部毗邻中亚, 与处于

中国, 波斯, 印度中间地带的巴克特里亚关系异常瞩目。巴克特里亚在不同的时期都是印度文明, 中国和地中海文化一个汇合点或者前哨。在巴尔克 (Balkh), 从中国而来经由帕米尔高原和从印度与伊朗沙漠而来的道路于此相交结合。亚历山大东征, 正是沿着这些穿越巴克特里亚的路线率领自己的军队南下入印度<sup>[32]</sup>。这也就是说, 在公元前4世纪前的亚历山大东征之前, 这些路线就应当已经存在。

从考古资料来看, 阿尔泰地区的巴泽雷克出土物证明了西亚与中国北部阿尔泰地区联系的存在。巴泽雷克墓葬因出土物包含多种文明因素而为学者所瞩目。例如在墓葬5出土一件女性服装, 从其上面的装饰图案和编织方法学者基本可以确定是从西亚而来而非本地所产。而且在波斯波利斯 (Persepolis) 所出土的一件波斯印章上有着与服饰上相似的图案<sup>[33]</sup>。处于阿尔泰地区与波斯之间的阿姆河流域所出土的宝藏也可证明波斯与北部阿尔泰通过中亚之间的联系。

南部路线从德黑兰 (Tehran) 到麦什德 (Meshed), 然后凭借其天然地理上的延续一直到印度。经波斯与阿富汗边界的 Farah 和坎大哈 (Kandahar), 一方面使得兴都库什的门户向印度西北部河流的下游和重要的中心市场木尔坦 (Multan) 开放, 另一方面通过基达 (Quetta) 峡谷和波伦山口 (Bolan Pass) 直至印度西部河流的下游和木尔坦地区<sup>[34]</sup>。印度与波斯之间紧密的关系是毋庸置疑的。印度的蚀花石珠经由波斯销往近东, 近东一带的玻璃经由波斯传入印度。大流士甚至把印度河流域纳入自己帝国的版图之内<sup>[35]</sup>。

从上可知, 远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前, 西边地中海地区, 东边印度, 北部的中亚已经经由波斯紧密联系在一起。正是波斯这种已经存在的沟通作用, 从中国延伸而出的丝绸之路才能一路畅通达到地中海地区的欧洲罗马。可以说, 波斯对国外丝绸之路的开通铺垫了坚实的基础。

至于帕米尔与新疆一带的联系, 无论是丝路开通后还是开通前, 新疆塔里木盆地是中国对外的一个门户。斯坦因 (Stein) 在1925就指出, 对以穿过帕米尔直到塔里木的交流路线, 其重要性在于在远古时代他们就起着塔里木盆地和阿姆

河地区(Oxus Region)之间商贸和文化联系的大动脉作用。这一路线包括巴克特里亚(Bactria)和粟特(Sogdiana)在内。而这一重要繁荣的地区在早期被伊朗人占领并被后来的远东希腊文化和印度的佛教渗透影响。总体东西走向的帕米尔峡谷似乎很显然促进了他们对这种交流的作用<sup>[36]</sup>。

这样,作为中国门户的塔里木盆地经过帕米尔与波斯联系起来。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希腊人Aristeas于公元前8或者7世纪的时候从巴克特里亚(Bactria)到中国的西部<sup>[37]</sup>。

结合蜻蜓眼式在伊朗的出土情况与伊朗与邻国的关系,蜻蜓眼式玻璃珠完全是有可能从伊朗经帕米尔一带进入塔里木盆地。塔里木盆地南部边缘的且末扎滚鲁克出土的蜻蜓眼式玻璃珠似乎证明了这一可能<sup>[38]</sup>。这也就是说,在西汉前伊朗在中国的对外交通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正是这种早期的联系为以后丝路的贯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总之,通过以上论证,蜻蜓眼式玻璃珠最初起源于埃及,凭借地中海沿岸各国的紧密联系,迅速传遍整个地中海地区与波斯,并且达到黑海北岸。地中海与波斯成为蜻蜓眼式玻璃珠的生产与分布中心。从国内外蜻蜓眼式玻璃珠的出土情况与自身特点,虽然我们不能明确确定国内蜻蜓眼式玻璃珠具体来自哪个国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是和地中海地区密切相关。鉴以伊朗蜻蜓眼式玻璃珠出土情况以及当时与中亚的交通,中国境内玻璃珠一部分来自伊朗亦有着极大可能。

至于其传入路线,一方面和欧亚大草原存在着紧密联系,即经欧亚大草原过中亚首先来到新疆。同时,伊朗高原历来和北面的中亚存在着紧密联系,而且伊朗高原亦发现大量的各式蜻蜓眼玻璃珠。因此,我们不能忽视一部分蜻蜓眼式玻璃珠经由伊朗高原北上经帕米尔地区传入中国新疆塔里木地区的可能。一些学者所认为的蜻蜓眼式玻璃珠从印度首先到达中国南部的云南和经海路商道引进的观点,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考古资料都无法证实西汉前这两条蜻蜓眼式玻璃珠传播路线的存在。换言之,蜻蜓眼式玻璃珠的传入亦无法证明春秋战国时海路的开通和南方滇缅路的存在。反之,蜻蜓眼式玻璃珠的传播路线倒是让我们可以看到,新疆塔里木盆地在对外联系中

扮演着至关重要的门户作用即西汉前的中国通过塔里木一带和国外发生着积极的联系。从地理来看,周围的阿尔泰,天山,帕米尔高原之间的峡谷盆地与蜿蜒其中的河流提供了对外天然通道。蜻蜓眼式玻璃珠的传入也让我们了解到,早在春秋战国之际,地中海与中国已然存在联系。并且从其传入路线中可以得知当时存在着南北两条路线。北部,经由欧亚大草原经费尔干那,天山至塔里木盆地把地中海和中国联系起来。南部通过波斯直达帕米尔一带至塔里木盆地的路线亦使得地中海和中国产生联系成为可能。正是这种久已存在的联系,为以后以西安为起点直达地中海地区的丝绸之路打下了基础。

注释:

[1] William Charles White, Tombs of Old Lo-Yang, Limited Shanghai 1934, 153-158.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工作队、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管所:《新疆轮台县群巴克墓葬第二、三次发掘简报》,《考古》1991年8期,694。

[3]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物管理所等:《新疆且末扎滚鲁克一号墓地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3年1期119页。

[4] 安家瑶:《镶嵌玻璃珠的传入及发展》,见《十世纪前的丝绸之路和东西文化交流》362页,新世界出版社1996年。

[5] 张正明:《料器与先秦的楚滇关系》,江汉论坛1988年12期68-72页。

[6] 后德俊:《楚国的矿冶、髹漆与玻璃制造》264-268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

[7] 张增祺:《晋宁石寨山》103页,云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

[8]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2期145页。

[9] K. DE B. Codrington, A Geograph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Central Asia, Vol CIV Nos 3, 4, Sept-Oct. 1944, 73.

[10] Evert Barger, Some Problems of Central Asian Exploration,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CIII Nos 1, 2, Jan-Feb, 1944, 3.

[11] 吴焯:《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的认识误区》,《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

[12] 《史记·吴太伯世家》1467页,中华书局1959年。

[13] 后德俊:《楚国科学技术史稿》105页,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

[14] 广东省博物馆、肇庆市文化局发掘小组:《广东肇庆市北岭松山古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11期。

[15] Lois Sherr Dubin, the History of Beads From 30.000B.C.to the Present. Thames and Hudson Ltd, London 1987, 308.

[16] Alastair Lamb, a Note on Glass Beads from the Malay Peninsula, Journal of Glass Studies Vol VIII, 1966, 80-94.



[17] Kishor K.Basa, Early History Glass Beads in Thailand and Peninsular Malaysia. Southeast Asian Archaeology, 1990 Special Issue, 85-102.

[18] Gustavus Eise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ye Bead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20, 1916, 1-27.

[19] W.M.Flinders Petrie/J.Garrow Duncan, Hyksos and Israelite Cities, London Office of School of Archaeology University College, Gower street, W.C and Bernard Quaritch, 15 Piccanilly, W. 1906. 17-18.

[20] George Sarton, Chinese Glass of the Beginning of the Confucian Age. Isis Vol. 25, No.1 (May 1936), 73-79.

[21] Earle R. Caley, Analyses of Ancient Glasses, the Corning Museum of Glass, New York, 1962, 45.

[22] Kari Kari Kunter, Glasperlen der vorroemischen Eisenzeit IV nach Unterlagen von Th.E.Haevernick, Verlag Marie Leidorf GmbH-Espelkamp, 1995. 28-29.

[23] Hall, M/Yablonsky, L, Chemical Analyses of Glass Beads Found in Two Sarmatian Burials. Archaeometry 39, 1997, 369-377.

[24] H. C. Beck/C. G. Seligman, Barium in Ancient Glass. Nature, June 30, 1934, 49.

[25] Sergei I. Rudenko, Translated and with a Preface by M.W Thompson, Frozen Tombs of Siberia, J.M Dent and Sons Ltd, London 1970. fig 55, fig.89.

[26] A.Leo Oppenheim. Volume 21 (1967), Essay on Overland Trade in the First Millennium B.C., Journal of Cuneiform Studies Volume 21, 1967, 252.

[27] M. Spaer, Some Ubiquitous Glass Ornaments of the Early Centuries of the First Millenium BC. George Kordas, Hyalos Vitrum Glass, Thens 2002, 55.

[28] Thomas W. Beale, Early trade in Highland Iran: A View from a Source Area, World Archaeology, Vol.5, No.2, Trade. (Oct

1973), 133-148.

[29] V. I. Sarianidi, Translated by Luba H. Kowalski, The Lapis Lazuli Route in the Ancient East, Archaeology, Volume 24, January 1971, 12-15.

[30] K.DE B. Codrington, A Geograph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Central Asia,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CIV Nos 3,4 Sept.-Oct.1944, 73.

[31] Eileen Humphreys, The Royal Road, Scorpion Publishing Ltd London 1991, 33.

[32] Evert Barger, Some Problems of Central Asia Exploration, Tenth Asia Lecture, Meeting of the Society, 20 December 1943, 5.

[33] Sergei I. Rudenko, Frozen Tombs of Sieberia, J. M. Dent and Sons LTD. London, 1970, 295-296.

[34] K.DE B. Codrington, A Geograph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Central Asia,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CIV Nos 3,4 Sept.-Oct.1944, 73

[35] Carl D. Buck, A New Darius Inscription, Language, Vol. 3, No.1. (Mar., 1927), 2.

[36] Sir Aurel Stein, K.C.I.C, F.B.A, Innermost Asia: Its Geography As A Factor in History,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LXV No.5 (May 1925), 381.

[37] Philip Yampolsky, The origin of the Twenty-eight Lunar Mansions, Osiris, Vol 9, 1950, 71; Reference is to the Arimaspen of Proconnesus, a lost work which was partially summarized by Herodotus, and is believed to date from the 6th or 7th century B.C. Hudson, G.F., Europe and China, Edward Arnold, 1931, 27-30.

[38]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物管理所等:《新疆且末扎滚鲁克一号墓地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3年第1期119页。

(上接第23页)

2、4座宋墓的发现,为进一步了解大渡河中游地区宋代墓葬的分布、葬俗、葬制等方面具有着一定的作用。其中两座宋墓均为竖穴土坑墓,均为将人骨、随葬品和棺材放在墓室后,进行焚烧。使得墓室内堆积着大量的草木灰和红烧土。随葬品主要有釉陶碗、四系罐和“开元通宝”铜钱。

3、宋代石制结构建筑的发现,在大渡河中游地区尚属首次发现,为进一步研究这一时期本地区民族的特点、建筑风格等方面具有着重要的作用。

发掘领队:周科华

发掘人员:陈卫东、葛磊、及康生、张燕宏

绘图:周小楠

执笔:陈卫东

注释:

[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四川石棉三星遗址先秦遗存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08年第6期。

[2]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四川江油小溪坝阴平遗址发掘报告》,《四川文物》2004年增刊。

[3]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成华区三圣乡花果村宋墓发掘简报》,《2001成都考古发现》科学出版社,2003年10月。